

绪论：做人先立身

为何做人先立身？

任何人要取得成就，绝不是一蹴而就，一举成名，必须有个形成的过程。因为要取得成就，要有德有才，而德才都需要积累，经过长期的主观的努力和实践的锻炼。立德要常内省和向贤者看齐，多积善才成德；才能，要努力学习，这包括接受前人的知识，经验、教训，以及自己在实践中学习和研究所得，积少成多，才能对前人有所超越。

所以，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达到成功成名，必须先立身，即立德积才。

如何立身？试从下列五方面探索——

一、关键是善学

要立身，关键是善于学习。

从来没有天生的圣人，只有在后天勤学而成的圣人。也没有只因聪明而成的天才，凝成其天才的比例，也是二成聪明八成勤奋。古代儒学名家，不论是孔子或后儒孟子、荀子等无不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作用。被人称为圣人的孔子，他有的高足说他是“生而知之”，而孔老夫子却老老实实的承认他“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即是“学而知之”，也是说他在后天学习才成名的。孔子有句名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要小看这寥寥“八字”，阐明的却是后儒纠缠不

休的“性善”、“性恶”的大道理。这句名言是说，人生下来，性是差不多的，可是经过后天努力学习与否、相差就很远了。本来，孔子这句名言对人性已论述得很正确很清楚了。但是后学者对于古人甚至对其祖师爷的话，往往是根据其当时的需要及其理解加以解释，以为我所用，这是历来如此，不足为奇。孔子的后传弟子孟子和荀子就是这样，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为这“善”“恶”一字之差大打笔墨官司。不过他俩跟孔子还有一致之处，也都认为后天学习或改造与否对人性善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孟子主张“性善”，但他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也就是要在后天努力学习才能为善。荀子认为“性恶”，必须在后天强迫其学好，即教化之、制裁之，才能使之改恶从善。这三位儒学大师，还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孔子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孟子和荀子也都是到老仍好学。这就是他们有大学问的主要原因。

人的一生，可以说是学习的一生。这是因客观不断变化发展，人的学习也就无止境。

人自呱呱堕地，除了有简单的感觉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需要学后才知。六岁时开始择师或入学读书，在年青时是学习和积累知识时期。及长进入社会，虽有书本知识，一时还难对工作应付裕如，将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这需要自己不断去学习和摸索其解决办法。人的一生，在家庭和学校的时间不过二十年左右，如果以六十岁退休计算的话，工作的时间长达四十年左右，以学习来说，这个时期任务更重，因为他需要面对新的现实，对付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形势。即使是退休了，还要老有所为。需要再学习。

概言之，人的一生，要接受三个阶段的教育，即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三种教育缺一不可，对于人的成长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家庭教育靠父母，学校教育靠老师，社会教育靠群众。

要重视家教

在孩童时，家教至为重要。古人有云：“教子婴孩。”这时的孩童有如一张白纸，父母就是画师，画得好坏决定于画师的画艺如何。纵观历史上富贵之家，子女能成才的很少，因他们自幼就娇生惯养及长就恣意玩乐加上父母的溺爱就会走入邪门。今天只许生一个孩子，父母倾其钱、力溺爱之有如“小皇帝”，尽量满足其吃玩，致无心读书，逐渐养成不良习惯，殊堪忧虑。“严加管教出佳儿”，这是历史上总结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值得今天为人父母者学习。在父母中，母亲接近孩子较多，对孩子的影响也较大，有不少古圣先贤都是贤母培养下成长的。孟母三迁其家、断机教子，以及买猪取信于子等故事，便是典型的先例，正是在孟母从学习和道德两方面抓紧教育，孟子才自学成才。苏轼成为大文豪、著名良吏，也与其母程氏的教育有关，不仅“亲授以书”，并进行德育，勉励他学范滂做人。苏轼遵母训，努力读书，及长为官清正，爱护百姓。海瑞少孤，全靠母亲教育，不仅口授《孝经》、《大学》、《中庸》等篇和历史知识，她的刚毅品质和节俭作风对海瑞的成长影响很大。海瑞曾说：“瑞今日稍知礼义，勉自慎饬，若非冲年背父者，尽母氏谆谆开我力也。”有些贤母，不仅在儿子幼时教其学好，及人仕途仍然关注，特别是对儿子的品德和行为，正确的加以勉励，错误的及时予以批评。如隋崔氏对其子郑善果，东晋时湛氏对子陶侃，清时李氏对子尹会一，就是如此。有的贤母还能以身教勉子从

大义，如王陵母伏剑拒绝项羽召其子王陵来投，死前，嘱使者转告其子追随刘邦，终成功业；东汉时为鲜卑以为人质的赵苞母亲，因受王陵母的影响，也宁死勉子从大义，以击退鲜卑的入侵。父母同心协力管教儿子，对儿子的教育收效更大，如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妻马皇后都严于教子，所生五子，即朱标、朱棣、朱？、朱棣、朱棣，有的德才兼备，有的智勇过人，有的虽有错误而能及时改正。

读书很重要

我国留传下来的书籍，是我国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智慧、品德的总汇，通过读书，可使我们增知识，长技艺，明是非，提高道德水平。只有继承前人一代代积累智慧和品德，再经自己将之发扬，才能更好地树立人的形象。

人生下来，不是已经是人，就有了人的形象，为什么还要树立？人生下来虽有人外貌，而要具有人的形象，除了外貌外，还要有人的特征。而人的特征是什么？人与万物之区别，就是人具有智慧和道德，这就是人的特征。但是这一特征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开始就有的，是经过无数代的先人不断实践，才能形成人的特征，塑造成人的形象，并使人的形象日见高大。当人的特征形成后，对于具体个人来说，尽管具有这种“基因”，自己要具有这种特征需要自己努力学习，继承前人的智慧和道德。而这只有读书才能了解，才能继承，而继承才能在实践中将之发展。人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没有智慧和道德是不行的，而智慧和道德的高低，将决定人的成就的大小。

孔子很重视读书，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把

读书当人最快乐的事。他认为学不学截然相反，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这是说，人的仁、智、信、直、勇、刚等好的品质，是在学习中形成的；如果不学习，也将流于愚、荡、贼、绞、乱、狂等弊病。

学既如此重要，而为学之道又如何？唯一“勤”字而已。人虽有聪明与否的差别，但勤能补拙，勤者终有成；而即使是最聪明的人，如不勤学，也是昙花一现而已。而勤学的人，任何困难也吓不倒，因勤奋而成才的历史不乏其人。苏秦游说诸侯碰壁，归来狼狈不堪，受尽父母妻嫂冷视，于是他发奋读书，“引锥刺股”苦学，纵横术大进，游说诸侯合纵抗秦，任六国相和纵约长，率六国军击秦，使强秦不敢出函谷关，功业辉煌一时。宁越不过是战国时一农民，后因发奋比常人加倍苦学，也就“所学倍人”，结果从无学问到有大学问，成为王者之师。汉人匡衡“凿壁偷光”，晋人车胤“囊萤照读”，说明家穷到无钱买油点明读书也阻挠不了勤学者，苦读之下终于成名。宋朝范仲淹、明代宋濂，家穷挨饥受寒，也不以为苦，即乐在读书中，始终手不释卷，后成名成家。三国时吕蒙原是一莽汉，宋代狄青原是一大兵，因笃志于学，都成名帅。而勤学白丁成大师的大有其人。孔子的高足子张和冉雍都出身贫贱，原都是白丁，大字不知几个，在孔子教诲下，自己勤于学习，都成大儒。汉武帝时任相的公孙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都是成年后发愤读书而成名。清代大儒汪中、李颙也都是自学成学者。而学有大成者，莫不以其一生专于所业，而且恃之以恒，如孔子一生，即学和问的一生。“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以及古文，“故运动”的继承和发扬者

欧阳修，为学专而精，故都成为大文学家。清代经学大师顾炎武和戴震，其学有大成，都因学能坚持，一生博览古籍，精研经学。

实践更要学

一提起学习，人们也许以为学习只是读书，学习知识，其实学习不仅限于此。学习知识固然很重要，但在实践中学习和探索同样重要，从某方面说更有特殊之处，即一个人能否有大成就，或有超越前人的发明创造，都决定于他在实践中学习和探索得如何。

古往今来，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同是学于一位名师，或同毕业于一间名牌大学，在读书时彼此学到的知识差不多，但是入社会后发展不同，差别很大，有的有大成就，有的默默无闻，有的堕落腐化，其原因何在？这无他，是因在实践中努力学习和探索与否，以及学好学坏而已。

凡成大业者都与在实践中善于学习有关。古之开国皇帝莫不善择师虚心学习，如商汤以伊尹为师，周文王、周武王以姜尚为师，隋文帝以高颉为师，唐太宗以房玄龄、魏征为师，忽必烈以刘秉忠为师，正是各在其师的辅佐和教导下，打天下治国家，各完成其盖世功业。治世大须学问，刘邦和赵匡胤开始都认识不到此，刘邦曾破口大骂为之说诗书的儒生陆贾说：“乃公马上得之，安论诗书！”赵匡胤也曾嘲笑读书人说：“之乎者也 助得甚事？”后知史可为鉴诫对治国有用，都有了 180 度的转变：刘邦请陆贾为他写《新语》总结兴亡之道，从中采纳“无为而治”作为治国方针，才能巩固汉初的统治；赵匡胤也认为“作相须用读书人”，从此，重视儒士，自己也好读书，在全国兴学倡学，使宋初文明冠世。干中学

人更明智：刘秀在军中手不释卷，因而在与群雄逐鹿中，比别人高明，故天下无敌手，终能一统天下；曹操不只年青时奋志读书，老了更好学，因而谋略超群，如他的焚书信、矫情任算降仇敌，都是从书中向刘秀学来的，至于他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也是从总结历代的用人经验中提出来的。康熙一生都勤奋好学，因而识通古今，能以前代治乱的经验教训作为安邦治国的鉴诫，故能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积学以用于时，张良与萧何就是如此。张良伏击秦始皇不中，逃匿于下邳，因他尊敬老人，得传《太公兵法》，他日夜诵读，用心精研，尽得其奥妙，因而能为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辅佐刘邦成大业。萧何随刘邦入咸阳，别人抢财宝，只有萧何收秦国律令文书，他钻研学习，得以了解当时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人民疾苦，这对于他辅佐刘邦打天下治天下起了重要作用。

二、立身须立志

古之学者，都主张“尚志”；“尚”是高上，“志”是志向、意志，“尚志”意即高上的志向。立身必先立志，志既立，人就有了方向，就有了奔头，坚定地沿着既定方向前进，就有所成；不立志，就如无舵之船，无衔之马，飘荡奔逸，不知何去何从。从古到今，未见有不立志而有所成就的。诸葛亮认为“志当高远”。人有高远的志向，事业才可能有大的成就；如志向小，就易满足，成就也就小。当然，确立高远的志向，要实现不易，必须付之行动，拼力去干，不然只不过是空谈。志大还要才高，才可能实现；如果志大才疏，志大也是一厢情愿。而大才何来？只有努力学习和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

有人问孟子：“何谓尚志？”孟子说：“仁义而已。”（《孟子·尽心上》）对“仁义”昔人有它的理解，我们的理解：“仁义”的核心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有益的事，贡献自己的一切。这也是当今每个公民应有的高尚志向。如果立志而与这种“仁义”背道而驰，将会趋向邪门歪道。

大志者大成

在历史上有大志而有大成的人不乏其例。项羽和刘邦都曾见过秦始皇出游，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是豪言壮语，后来都实现了，项羽率领诸侯兵推翻了暴秦，刘邦在楚汉相争取胜当上了皇帝。当然，他俩能实现其豪言壮志，原因虽有种种，但正因他俩都有大志，故能为之奋斗不息，始能如愿。如果没有这种大志，就不敢为，就无从实现。陈蕃和诸葛亮在年青时其志都不凡。陈蕃是东汉时人，十五岁时自居一室，而庭前污秽，父辈有人来他家，对他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说：“大丈夫处事，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诸葛亮在荆州耕读时，每自比管仲、乐毅。正因陈蕃有“扫除天下”之志，及长入仕，对宦官乱政，敢与之斗争，为时人所重，后虽被宦官所害，虽死犹荣。诸葛亮因以管仲、乐毅为榜样，努力向之看齐，勤奋学习，故有智谋，辅佐刘备鼎足三分。班超和姜维都抱有远志，班超不甘心于抄抄写写工作，便投笔长叹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成子、张骞立功异哉，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于是投笔从戎，终于在西域立功封侯；姜维投蜀，母亲致书令求当归，维回信说：“良田百顷，不在一畝，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维为国忘家以行其志。于谦、岳飞都立志报国而忘私事。吴阶送岳飞一美女，岳飞坚辞说：“主

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岳飞正因全心为国，故在抗金中功勋卓著。于谦年青时就以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文天祥为榜样，及瓦剌入侵，大臣都畏惧而主张迁都避之，只有时任兵部左侍郎于谦挺身而出，率军退敌。虽有大功而口不言功，有人上疏封其子，于谦坚辞说：“国家多事，臣子不顾私恩。”岳飞、于谦二人都是国家的“万里长城”，因功大都遭奸佞所害，但都名垂不朽。

事业有种种，人志各不同，凡有益于世，都可称美趣，只要排除一切干扰，专心致志于其美趣，将有所成。李白的诗就是他的生命，歌颂真善美、揭露假丑恶是他的天职。而唐玄宗只把他当作“狎客”，命他写“云想衣裳花想容”赞扬贵妃之美的无聊诗篇，有“心雄万夫”之志的李白，怎能“摧眉折腰事群贵”，于是他毅然离开宫廷，回到民间去，在这无拘无束的天地里，诗人的真情得到了充分的流露，真情出真诗，一篇篇不朽的诗篇诞生了。明亲王朱载堉喜爱音律，不论在顺逆境都潜心研究，他对于荣华富贵都不屑一顾，要他继父职为王，也坚辞让位，专心致志写出了大型音乐学著作《乐律全书》，在世界上第一个创立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学说。封建社会以当官为荣，视科技为末，宋代沈括一生把科技视为头等大事，却以当官为其“副业”，他于天文、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通，在数学、光学、物理学、地理学及制图学诸方面均有发明和创造，所撰《梦溪笔谈》三十多卷，记载了他自己和群众多方面的科研成果。元代李治也埋头科研，尤其是数学，他朝夕推敲，苦心钻研，对我国古代代数方法天元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清代学者洪亮吉和唐甄，都曾入仕，后都因事罢官，他俩都不以穷为苦，而以著述为乐，志在益于时影响于后世。洪亮感时光之飞逝，“并日而学”竭

智著述，成为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唐甄居家，“炊烟屡绝，至采枸杞叶为食，衣败絮”却无愁容，手不释卷，写作不停，写成《衡书》，其志在权衡天下。此书论学论政，在经济上主张“富民”，说“尧舜之道无他，耕耨是也，桑蚕是也，鸡豚狗彘是也。”二百多年前，有如此见识，难能可贵。惜我国昔日执政者忽视这一发现，致国弱民穷，长期陷于挨打的境地。

要志正志笃

要实现其志，除有才智外，还要志正志笃，因为志不正就会作恶，志不笃就难以行其志。为何说志不正就会作恶？譬如说要立志当大官，但当大官有大权可以为善也可为恶，当大官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必当贪官做坏事，不仅损国害民，自己也将身败名裂；如当大官能为国为民做好事，其志就正，将有大贡献，以至名垂青史。志正不正，要以道德和贡献衡量之。正志必须修德积德，而决定一个人的善恶不能只看一事一时，要看其整体行为而定论。修德要积善，多积善才成德；坏人因多积恶而成坏人。为何说志不笃就难行其志？因为立大志只停留在口头上，或意志不定半途而废，所立的大志也是空志。要行其大志，必须做到“贫贱富贵不动其志，生死祸福不变其守。”总而言之，志不立则无所成，要实现其志使有益于世，其志要正要笃。

人之志正与否，决定于能否修德。刘备临死时留下遗诏嘱其子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这是刘备一生身体力行和切身的体会。不注意修德而作恶，开始恶虽小而为之，小恶积多就形成恶性，将为大恶；如注意修德，善虽小而为之，多积善就形成善性，可为大德。刘备从贩履织席之徒到鼎足三分称帝于西蜀，是因

他能修德和坚持以德服人，他礼贤下士，关心人民疾苦，故得人心成大事。刘禅不听其父所嘱，疏贤亲佞，小善也不能为，只听信佞臣黄皓之流为恶，致亡国为囚虏。

古代学者多穷，而他们能成为学者，因他们能安贫乐道。可以说，“乐道”是志，“安贫”是德，如果没有“安贫”之德，也就没有“乐道”之志，正因有“安贫”之德，才成“乐道”之志，这两者是他们成为学者必不可少的。孔子是“安贫乐道”的提倡者，他因能安贫乐道才成为圣人，他的高足颜渊能向他看齐，得到他老人家的满口赞誉。师徒如此，成为后儒学习的榜样。清代颇多安贫乐道之士。张履祥一生以耕读为乐，他既授徒，也种地自食其力，他说：“人须有恒业，无恒业之人，始于丧失其德，终于丧其身。”他著述颇丰。学者沈昀家贫断炊，掘庭前马兰草充饥，饿得发晕，人怜其贫赠米也拒绝，其廉洁如此。其学以诚敬为宗，以适用为主，反对空谈，他对其门徒说：“尼父言‘躬行君子’，若腾其口说以术胜，非所望于吾也。”

在这里要附带一提的是，孔子提倡的“安贫乐道”并非否认物质的基础和反对追求富贵，他是主张“富民”的，对于自己，他曾说过如富贵可求虽代人“执鞭”即赶车的事也干，但不能违背其“仁义”学说，否则他宁安贫而不要富贵，自乐其道，即坚持其“仁义”之道。这就是儒家的人生价值观，也是儒家所谓“君子”的气节。

三、先战胜自己

人们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首先要战胜自己。战胜自己什么？即要克服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因为自己存在的缺

点和错误将影响和阻碍你前进，以至失败。在事业的征途上，自己不存在缺点和错误，竞争的对手就无法战胜你；如是你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让对方有可乘之机，就会轻而易举地战胜你。

不战胜自己，就不能战胜别人。历史上曾经屡战屡胜的西楚霸王项羽和具有万人敌的关羽，之所以被打败，恰恰是他俩自己先打败了自己，即其本身存在的缺点，使自己犯了错误，致被敌人钻空子将之打败。项羽在秦末大乱中兴起，是一个叱咤风云、举鼎拔山的盖世英雄，身经七十余战，每战必克，跟他争天下的刘邦，与之战屡战屡败，几次死里逃生，而为何最后胜利不属于他而属于刘邦呢？其原因虽有种种，关键的是正如韩信所说的项羽存在“妇人之仁”的缺点。别看这位霸王一下子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残暴得很，但他对自己所属和战友就不同了，对人关怀到有点婆婆妈妈，心地软得像女人一样，所以处理问题时就显得优柔寡断。范增在鸿门宴上劝他杀刘邦，因他与刘邦曾经共同联手反秦而于心有所不忍，范增叹气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后果如范增所料，垓下一战，霸王别姬，乌江自刎。关羽有万人敌，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好汉，你看他在北伐中，何等威风凛凛：水淹曹魏七军，降于禁，擒庞德，曹操吓得要迁都避之，但随之为何走麦城，被东吴一并不扬名的小将擒杀了？这是因他骄傲所致。关羽这人一贯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喜人给他戴高帽子，东吴吕蒙就抓住他这个弱点，借病休养让未有远名的陆逊代守陆口，陆逊致书把他捧得飘飘然，关羽也就对之毫无戒备，麻痹轻敌，调大部兵北伐，使吕蒙偷袭荆州得手，在曹魏和东吴的两面夹击下，关羽全军溃散，只有走麦城这条路，终于束手被擒。

杀。

项羽和关羽的下场，说明克服自己缺点以避免犯错误致遭失败的重要意义。

克己靠自觉

世上无十全十美的人，是人总有缺点和犯错误，又因人终究是人，人是有智慧有道德的，因而是能够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而能不能就决定于自己，但要靠其自觉，严以律己，有过则改，改过就无过，犯了错误总结教训就可不再犯，且能提高自己。

克己自觉的人，有错误就自责自改，韩愈将“其责己也重以周”的人称为“君子”，即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秦穆公和诸葛亮就是这样的君子。穆公不听蹇叔劝告出兵伐晋，全军覆灭，三大将被俘，后三大将被释放回来，秦穆公不责备他们打败仗，反而穿着丧服前去迎接，哭着自责说：“孤违蹇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他的自责显示他能实事求是，认识错误，总结教训，且具有不诿罪于人的高尚品德，因而得军民心。得人心者昌，故他后来能称霸于天下。诸葛亮在街亭之战后，也能引咎责己。街亭之败虽然是因主将马谡违背其部署所致，但诸葛亮用错马谡，应负用人不当之责，故自请贬三等。他还要求所属“勤攻吾之阙”，以利再战。因而尔后不再重蹈这次惨败的覆辙，且因此更得军民之心，奋发图强，而忘其败。

是人总有私欲，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人总是受到种种物欲的干扰，但能自觉克己的人，能控制自己的私欲，不使之害公，廉洁以奉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如北齐时的武卫大将军元景安，他与各军分守边防，各军将帅皆贪而已独

廉。宋仁宗赵祯贵为皇帝，其权可为所欲为，而他能自觉克己，常为他人着想，甚至忍饥挨饿，也不愿麻烦侍者。

能自觉克己的人，慎言慎行。唐太宗最能克己，他之所以能克己，是因他深知“载舟覆舟”之理，害怕得罪人民，他的帝位将不保，故“常谦常惧”，慎言慎行，怕其一言一行不当会贻害人民，因而能自觉克己，有错必改。

实践中内省

修身之道，自我内省很重要。所谓内省即反省自己的错误，能自觉内省，有错误就可及早发现，及早改过，以免错误发展成为祸害。

孔子对修身，强调“内省”和“求诸己”，但到后儒陆九渊、五阳明就只强调个人的“心性修养”，有脱离实践的倾向，如此“内省”对人的实践指导作用不大。只有从实践中内省，就能发现自己言行的是非，是的坚持，非的改正，才能反过来更好地指导人的实践。曾参和范仲淹都是将内省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曾参是孔子的高足，他遵照其师“内省”的教导，严以律己，“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因他以修身为本，坚持“三省”，使他学业和道德水平不断提高，他的学说成为儒学的一大宗，他是孔子弟子中最有道德者之一。北宋名臣范仲淹也能常内省，他说：“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当，则剿鼻熟寝。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范仲淹认为由君所赐而来自人民的奉养费，如所做的事与之相当就熟睡，否则一夜不安，明日要好好干以补偿之。范仲淹就这样经常鞭策自己，这促使他的“先忧后乐”的精神大

发扬，形成他的人生观，他不论在朝或在野，都是忧国忧民，正如他在《岳阳楼记》中所写：“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三国时魏国司空王昶也主张多反省以求无过，他告诫其子侄说：“人或毁己，当退而求诸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清乾隆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钱大昕也主张多求己过。他看人下棋，暗笑输者失算，及输者邀他下棋，他却输得更多，经过这次看棋和下棋的教训，他深深体会到：“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己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论人哉？”

四、勿自以为是

世上事物，最为复杂，又在不断变化发展，而个人所闻所见有限，不可能尽明世上的一切是非；即使对自己也不都了了，这有如自己的眼睛看不清自己睫毛一样，如自以为是，未有不犯错误栽筋斗的。

因此，切勿自以为是。

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确是千古名言，至今对于人们立身仍具有重要的鉴诫意义。

集众智者成

个人与群众比，群众是最聪明的。

为何说群众最聪明，《管子·九字》有精辟的论述：“目

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塞矣。”那么，怎样才能以天下之目视、耳听、心虑呢？办法就是要兼听群众意见及善于纳其中的正确主张，就可无不见，无不闻，无不知。能如此，就能集众智成大智，决策就正确，符合客观形势的发展，则事无不成。

历史上能善于兼听和纳言者，弱可变强，晋重耳、越王勾践和秦的兴起就是如此。重耳是晋国公子，因受谗害落难国外，后回国继位，是为晋文公。初，晋因内乱而削弱，他重用追随的久经考验的旧臣赵衰、孤偃、先轾等，言听计从，因而成霸业。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国家将亡，听范蠡计，厚礼为奴求事夫差，后得赦回国，他纳文种“九术”，终于灭吴称霸。秦原是战国时一个落后小国，经秦穆公、秦孝公、秦惠王到秦始皇四代广招天下士和纳其谋，逐渐强盛，以至天下无敌，秦始皇灭六国成帝业。

善纳言的人，也可从昏到明。如齐景公是个昏庸的糊涂人，按照他意下行事，国不亡才怪呢。但他还有一点长处，就是比较听从贤相晏子的进谏，纠正了许多错误，因而在争霸兼并激烈的春秋时代仍能保其国。刘邦原是个好酒色、说大话、耍流氓的无赖，起义后既无武艺，也少智谋，老出错主意，但他有个超人的优点，有错则改，能听张良良谋，纳陈平奇计，以此与项羽斗智，终于打败了举鼎拔山的盖世英雄的西楚霸王项羽。唐太宗的昏话昏事也不少，仅魏征进谏的就有二百余事之多，由于他能鼓励群臣进谏，又善于纳谏，故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明君。

兼听要明断

人是社会的人，人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独居，不论干什么事，都必然与群众发生关系，不是你影响别人，就是别人影响你。当你兼听的时候，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听谁的话好呢？如果你无主见，必然是犹柔寡断，错过机会，或采纳错误的意见，导致失误；如果你早有成见，合己意的同意，不合己意即使对的也不会听，这就失去兼听的意义。因此，兼听要能明断，才能采纳正确的意见。

明断是一门大学问，能否明断，这与个人素质、才识、经验和思想方法都有关系。譬如说你是有公心的人，利于私的将拒绝，利于公的就采纳；你是自私自利的人，则反之。如你是个有卓越见识和富于经验的人，对各种意见的优劣就易于断定是非，否则就难。如你思想方法能实事求是，就能有助于断定真伪、是非，是先人为见的话，就易于以伪为真、以非为是。

历史上亡国之君，他们并非不兼听纳言，而是听佞臣而拒直臣之言，纳错误意见而弃正确的建议。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跟他的素质有关，概言之有三种人：

一是独断独行。封王、隋炀帝和崇祯帝就是这种典型人物。他们都是有才干的人，其致命伤都是自矜其功，自夸其才，天下第一，他说的就是对，不容人反驳，不然就杀头。如封王淫乐残暴，箕子、比干进忠言，前者囚禁，后者剖腹，纳岳臣崇侯虎谗言，囚文王，酿九侯，脯鄂侯，造成众叛亲离，周武王为民伐封，封王战败自焚。隋炀帝是顺己者升官，逆己者杀头，因而两耳只听到颂声，及内外叛乱，逃到江都后